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06期(民國108年12月),87-1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南胡北黃：
民國地理學的分野（1936-1952）*

張雷**

摘　要

1936年黃國璋主持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與胡煥庸主持的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南北呼應，形成中國地理學上的「南胡北黃」格局。具體而言，北派是以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和清華大學地學系為中心，依託中國地學會，強調歐美地理學範式；南派則是以中央大學地理系和浙江大學史地系為中心，依託中國地理學會，側重中國本土地理學範式。兩派之爭始於學術傳統和地域分異，繼而擴展至地理學會、學術機構、學術範式，以及學術研究的紛爭，終以政治收場。地理學的南北之分不僅契合民國學術的南北分野和政治中心的轉移，同時反映中國本土地理學和西方地理學之間的張力，深刻塑造了中國近代地理學的構建與敘事。

關鍵詞：胡煥庸、黃國璋、中國地學會、中國地理學會、地理學史

---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以及集刊編委會與校訂者的辛勞，同時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美國雪城大學檔案館（Syracuse University Archives），芝加哥大學檔案館（University of Chicago Archives）提供的幫助。本文在香港嶺南大學 Faculty Research Grant, 2018/19 支持下完成（Funding Reference: 101874），在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18年11月23日，通過刊登日期：2019年9月9日。

** 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前　言

中國近代地理學史的書寫通常以 1909 年張相文（1867-1933）在天津成立「中國地學會」爲標誌，其後與 1934 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國地理學會」合爲一體，形成以竺可楨（1890-1974）爲宗師的一元民國地理學敘事。[1]其實，中國地學會和中國地理學會並未合二爲一，而是各自代表民國地理學術的兩大譜系，南北並立。[2]這一點長期爲學界忽視，因而遮蔽了民國地理學術的南北分野，導致無法構建完整的學術譜系。同時，雖然民國時期奠定了中國現代地理學的學術框架，中國地理學史的著作卻多至清代即戛然而止，民國地理學史的研究則缺少必要的主線和深度。[3]

民國學術格局若以地域而論有南北之分，所謂學分南北。[4]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開始建立國家學術研究機構與評議機制。1928 年中央研究院和 1929 年北平研究院的成立，使南京和北平兩大學術中心的南北並立制度化，而中國地理學的南北分異對應了兩大學術中心。1936 年黃國璋（1896-1966）主持北

1　將竺可楨塑造爲民國地理學正統的代表始於民國時期，例如 1935 年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張其昀綜述中國地理學二十年來的發展，1948 年另一位中央大學地理學教授任美鍔書寫民國地理學術史，都突出竺可楨和中央大學的正統地位。參見張其昀，〈近二十年來中國地理學之進步（上）〉，《地理學報》，卷 2 期 3（1935 年 7 月），頁 93-131。任美鍔，〈最近三十年來中國地理學之進步〉，《科學》，卷 30 期 4（1948 年 4 月），頁 103-113。

2　在民國地理學史著述中，目力所及，只有劉盛佳略有論及民國地理學的學術中心以及學術譜系，參見劉盛佳，《地理學思想史》（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頁 272-274。

3　王庸的《中國地理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是第一部中國地理學史專著，但以中國古代地圖史料爲主。侯仁之的《中國古代地理學簡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62）明確以古代地理爲主；王成組的《中國地理學史（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截至明末，弟子趙榮續寫到清代；鄒振環的《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和郭雙林的《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探討西學影響下的清末地理學。鞠繼武的《中國地理學發展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和胡欣、江小群的《中國地理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是兩部涵蓋民國地理學的專著，但並未理清民國地理學的譜系。楊吾揚的《地理學思想簡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涉及近代部分，但認爲近代地理學先天不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必然反映。

4　民國學術的南北分列，例如史學的北大新文化學派與南高學衡派，文學的海派與京派，學界均有論述。參見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而地理學，一門最講地域的學術，其南北分野卻鮮有學者論及。

平師範大學地理系，與胡煥庸（1901-1998）主持的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南北呼應，形成中國地理學上「南胡北黃」的格局。[5]本文擬梳理民國地理學的南北譜系與權勢之爭，以窺民國地理學術的構建及流變，進而重新審視民國地理學史。

一、南北地理之學

（一）北平：中國地學會

中國近代地理學肇始於張相文創設的中國地學會。張相文，字蔚西，江蘇泗陽人。張氏自清末投身地學，編著教材。1909 年在天津創辦中國地學會並任會長，出版《地學雜誌》。次年中國地學會移至北京，其傳統被北京師範大學史地系繼承，以白眉初（1876-1940）爲代表。白眉初曾任《地學雜誌》編輯和總編，是張相文的得力幹將。1917 年擔任北京師範大學史地系教授，1922 年充史地系主任。白氏留意歷史地理和邊疆地理，編輯全國地理書籍，注重國民地理教育。[6]

1928 年，清華大學聘請北平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1889-1971）籌建地理系，次年正式成立，後於 1933 年改稱地學系，先後聘用王成組（1902-1987）、張印堂（1903-1991）及洪紱（1906-1988）等留洋學生擔任地理教授，其中王成組和張印堂還有歷史學專業訓練。[7]北平的留洋地理學者重啓北洋政府時期

---

5 民國地理學南北對立的制度化和公開化是在 1936 年黃國璋執掌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之後，因此「南胡北黃」一說源於 1930 年代，又有「南張北黃」之說，張即浙江大學史地系主任張其昀，參見〈黃國璋在中國地理學會北京分會第四次會員大會上的檢討〉，《地理知識》，卷 3 期 7（1952 年 7 月），頁 184-185。竺可楨雖然爲南派地理學宗師，但他與張相文實爲民國地理學第一代學人，無論輩分還是時代，作爲第二代學人的黃國璋都不足以與之並稱。相反地，能與黃國璋相提並論的是竺可楨的兩大弟子胡煥庸與張其昀，而胡作爲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在職位和資歷上都足以代表南派，因此本文暫以「南胡北黃」爲題。

6 〈地理學家白眉初訪問記〉，《世界日報》，1935 年 5 月 15 日-24 日，第 7 版。

7 王成組（1902-1987），上海南匯人，1926 年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碩士，1929 年芝加哥大學地理學碩士。張印堂（1903-1991），山東泰安人，1926 年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1930 年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學碩士，長於邊疆地理。洪紱（1906-1988），福建閩侯人，1932 年法國里昂大學地理學博士，主攻經濟地理。

因經費短缺而時有中斷的中國地學會，在翁文灝的活動下，由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每月補助地學會 300 元經費。同時，在學術理念和路徑上改造中國地學會。《地學雜誌》以往所刊論文多是依據史例，搜羅故實；1928 年之後所發表質量較高的論著，幾乎全部來自北平的地理學家，如張印堂的〈中國古代文化之發展及其地理背景〉和翁文灝的〈清初測繪地圖考〉等。[8]

1934 年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顧頡剛（1893-1980）創辦《禹貢》半月刊，專門登載地理沿革文章，並隨後組建「禹貢學會」。[9]禹貢學會與中國地學會在歷史地理和邊疆地理有一脈相承之處。[10]此外，由於燕京大學與清華大學比鄰而居，兩校史地學者時有交往，[11]遂共同創辦《大公報．史地周刊》，標榜歷史學和地理學；[12]自 1934 年 9 月每周一期，由顧頡剛、張印堂及洪紱等七人輪流編輯，並常刊登禹貢學會以及北平地理學界的訊息，形成一個穩定的學術社群。[13]

北平的地理學術立足於深厚的歷史傳統，以北平師範大學史地系、清華大學地理系和燕京大學歷史系爲依託，圍繞張相文的中國地學會和顧頡剛的禹貢

8 北平地理學者在《地學雜誌》的發文，如：張印堂的〈中國古代文化之發展及其地理背景〉，卷 20 期 2（1932），頁 79-88；卷 21 期 2（1933），頁 183-194，翁文灝的〈清初測繪地圖考〉，卷 18 期 3（1930），頁 110-143，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王鈞衡的〈亞洲的地體構造和地勢配置〉，卷 20 期 2（1932），頁 89-110，以及鄒豹君的〈山東省農產區域之初步研究〉，卷 26 期 1（1937），頁 53-89。

9 〈發刊詞〉，《禹貢》，卷 1 期 1（1934 年 3 月），頁 2-3。

10 例如張相文和顧頡剛先後對河套王同春的發掘和塑造。1913 年張相文去西北考察時見到王同春，將其介紹給張謇，共同開發河套地區。1934 年，顧頡剛前往西北考察，發掘王同春，專門撰寫〈王同春開發河套記〉，《禹貢》，卷 2 期 12（1935 年 2 月），頁 2-10。顧頡剛以類似小說的傳記體筆法，將王同春寫得極爲傳神，所引材料亦頗爲豐富。對於發掘王同春開發河套的事跡，顧頡剛本人很是自得，所以一再地加以推介。

11 例如張印堂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同時在燕京大學歷史系兼課，爲禹貢學會會員，與顧頡剛時有往來。在顧頡剛日記中，常有訪問張印堂的記載。例如 1933 年 3 月 21 日張印堂來；3 月 25 日看張印堂君〈中國文化與地理關係〉一文，到張印堂處談話；1936 年 5 月 23 日訪張印堂。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卷 3，頁 26-27、477。

12 〈發刊詞〉，《大公報．史地周刊》（天津，下略），1934 年 9 月 21 日，第 1 版。

13 《大公報．史地周刊》自 1934 年 9 月起至 1937 年 7 月，每周一期，前後 180 餘期。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3，頁 274。

學會，與史學保持相當的關係。[14]又因北平爲北方重鎮，隨著日本從東北的威脅漸進，北平的地理學強烈關注邊疆，注重普及地理知識，培養民眾的國家意識，從而構成民國地理學的北平譜系。

（二）南京：中國地理學會

南京的地理學術源於 1919 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史地研究學會」，以史學與地學爲兩大主軸，具有深厚的歷史傳統和民族主義內涵，這就是南高史地學派，其中竺可楨是地理學的締造者。[15]1920 年竺可楨到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1921 年南高改組爲東南大學，竺可楨創建地學系，講授西方地理學與氣象學，並將野外考察引入其中，建立現代地理學，培養了包括張其昀（1901-1985）、胡煥庸、王庸（1900-1956）等民國地理學的第二代學者，其中以胡煥庸和張其昀爲代表。[16]

胡煥庸，江蘇宜興人，1919 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追隨竺可楨，以地理學爲己任。張其昀，浙江寧波人，與胡同級，師從竺可楨與史學家柳詒徵（1880-1956），治學兼顧歷史與地理，將南高的史學與地學熔爲一爐。[17]在研究方法上，胡、張二人均深受法國人文地理學的影響。胡煥庸 1926 年至 1928 年間在法國進修，師從人文地理學家白呂納（Jean Brunhes, 1869-1930）。張其昀雖未去法國，但也深受白呂納影響，並將白氏的《歷史地理學》和《人生

14 中國地學會的《地學雜誌》從 1910 年創刊至 1937 年停刊，共發表了 1,600 多篇文章，自然地理只有 100 多篇，其餘爲歷史地理和人文地理，參見林超，〈中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張相文和中國地學會〉，《自然科學史研究》，卷 1 期 2（1982 年 4 月），頁 150-159。即使在西方受過訓練的清華大學地理學家翁文灝和張印堂，在《地學雜誌》上所發的地理論文也是以歷史地理爲主。

15 有關南高史地學派的研究，參見吳忠良，《傳統與現代之間：南高史地學派研究》（北京：華齡出版社，2006）；陳寶雲，《學術與國家：〈史地學報〉及其學人群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16 南高史地派的地理學人，只有王庸北上，入清華國學研究院深造，任職國立北平圖書館，加入禹貢學會，撰寫《中國地理學史》，是南高史地學人極少跨越南北，與北方主流學界有交往的學者。

17 張其昀譯，〈歷史地理學〉，《史地學報》，卷 2 號 2（1922 年 1 月），頁 73-77。

地理學》譯成中文。[18]因此，竺可楨的兩大弟子胡煥庸和張其昀都以人文地理學著稱，立足中國本土，化新知於舊體，鑄造南京的人文地理學傳統。

1928 年南京成爲首都，南京的地理學術以中央大學爲依託，挾國都政治優勢日漸壯大。中央大學前身即爲東南大學。竺可楨引進美國芝加哥大學地理系碩士黃國璋加盟地學系，與胡煥庸、張其昀成爲系中的三駕馬車。1930 年地理系獨立，竺可楨放手讓弟子胡煥庸擔任系主任，自己則轉身致力創建中央研究院氣象所。中央大學地理系有共同的師承和地緣認同，以人文地理爲主，代有人才，培養出徐近之（1908-1982）、李旭旦（1911-1985）、任美鍔（1913-2008）、鮑覺民、吳傳鈞等民國第三代和第四代地理學者。[19]1934 年，竺可楨、張其昀、胡煥庸等在南京成立中國地理學會，總部設在中央大學地理系，由翁文灝任理事長，張其昀爲幹事，胡煥庸爲會計，出版《地理學報》，形成穩定的學術共同體，是爲民國地理學的南京譜系。

民國地理學術的南北分立並不僅是地域之異，而是存在範式的本質之別。以學術源流而言，南北地理之學均與歷史學相關，但在史學上卻是尖銳對立。北平史學深受新文化運動影響，以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爲宗旨，其中以顧頡剛的疑古派爲代表；而南京史學則爲具有強烈民族文化意識的學衡派，其中以柳詒徵爲代表，以倡明國粹，融化新知爲己任。例如南北兩派的歷史地理學，路徑和理念都大相徑庭。北平顧頡剛的禹貢學派是以地理注歷史，屬歷史學範疇；而柳詒徵弟子張其昀的歷史地理學則以歷史注地理，屬地理學範疇。[20]因此在南派看來，北派的歷史地理研究內容大都限於政治區域和名勝史跡的沿革和考證，這類沿革地理，其性質近於歷史的多，近於地理的少。[21]而南派的地理取

18　白菱漢（Jean Brunhes）著，張其昀譯，竺可楨校，《人生地理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19　中央大學地理系的師生在地緣上多來自江南。教師之中，竺可楨來自浙江紹興，胡煥庸爲江蘇宜興，張其昀爲浙江鄞縣。學生也多數來自江浙地區。李旭旦爲江蘇江陰人，任美鍔爲浙江寧波人，兩人均是 1930 年入中央大學地理系。

20　中國歷史地理學界通常以顧頡剛的禹貢學派爲宗。實際上，民國歷史地理學有兩條主線：一是禹貢學派；二是南高史地學派。南高的歷史地理學早於禹貢學派，而且理念有別，參見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

21　任美鍔，〈最近三十年來中國地理學之進步〉，《科學》，卷 30 期 4（1948 年 4 月），頁 109。

向同樣爲北派所詬病，例如郭敬輝（1916-1985）當時是河北省第一師範學校學生，因常在《大公報．史地周刊》和《禹貢》半月刊發表文章，被顧頡剛邀至北平參加禹貢學會，他批評張其昀編寫的《本國地理》教材，以地理區域取代行政區域，未兼顧歷史特性，欺己誤人。張其昀則回應這是根據地理學的通用規則分區，而郭敬輝尙未領馭原著，東鱗西爪，質疑盡是粗心浮氣的話。[22]而顧頡剛則認爲張其昀囿於中國傳統，著作只有常識而無學問，極盡貶低之意。「此君平日頗能留心搜集材料，惟不能融化，又不能自己提出新問題，發見〔現〕新事實，故其著作直是編講義而已。」[23]因此，南北雙方地理學之別，本質上是如何看待中國本土語境，這個問題在 1936 年之後更爲明顯。

二、學會之爭

民國初年，北京的地理學術一枝獨秀。1919 年南高史地學派誕生之後，南北開始並立。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南京的地理學術後來居上，1934 年成立中國地理學會。雖然南京在政治和學術上都足以成立全國性的地理學會，但是南派學者爲避免爭端，減少對立，做了相當的妥協。首先，中國地理學會對北平的中國地學會保持敬意，在其發刊詞中宣稱：「吾人對於北平地學會，深望承其先業，繼長增高，故國喬木，蔚爲榮觀。」[24]並爲此在《地理學報》創刊號上專門刊載〈張慰西先生別傳〉，向 1933 年去世的張相文致敬。同時，爲了增加中國地理學會的合法性，中國地理學會囊括中國地學會主要成員，如張相文之子張星烺（1888-1951）、顧頡剛、張印堂以及譚其驤等，張星烺和張印堂更位列中國地理學會的九位理事之中。

其次，中國地理學會在會長的選擇上也精心考慮，爲了平衡南北，會長並未由南派的地理學領袖竺可楨出任，而是選擇了翁文灝。與竺可楨立足南京不

---

22 張其昀，〈關於拙著本國地理分區之解釋〉，《大公報．史地周刊》，期 88，1936 年 6 月 5 日。
23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4，頁 53。
24 〈本會發起旨趣書〉，《地理學報》，創刊號（1934 年 9 月），附錄，頁 2。

同，翁文灝長期在北平主持地質調查所，參與中國地學會，創辦清華大學地理系，與北平地理學界淵源甚深。1932 年翁文灝到南京從政，與南京地理學界多有交集，加上翁又是浙江鄞縣人，與中央大學地理系同仁有江南地緣認同，因此無論在學術和譜系上都為南北地理學界所接受。翁文灝出任中國地理學會會長後，一任就是十年。

南派地理學界雖有妥協，但南北畢竟有別，交鋒漸多。例如清華大學地理系教授張印堂在《地理學報》創刊號上分析中國人口與耕地問題，依照歐美流行的地理學理論，指出解決人口問題的治標方法是移民墾荒，治本方法則是節育。而南京中央研究院氣象所研究員涂長望（1906-1962）則指出，張氏沒有涉及中國根本的社會制度問題，他認為中國人口問題其實與天災人禍密切相關。[25]總而言之，中國地理學會成立之後，民國地理學的南北分野開始制度化和公開化，而關鍵人物是黃國璋，戰場正是中國地理學會。

黃國璋，字海平，湖南湘鄉人，自幼習英文，1919 年從長沙雅禮大學（Yali College, 美國耶魯大學校友創辦的教會學校）畢業後，在該校的中學部教英語和地理，兼任教務長。1926 年黃國璋在雅禮大學資助下，入耶魯大學地理系，師從地理名家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1927 年轉入芝加哥大學地理系，1928 年獲碩士學位。[26]黃與王成組等人為民國時期最早留美學習人文地理者，深得美國地理學精髓。隨後黃國璋被竺可楨聘為中央大學地學系教授，開設人文地理、北美地理和地理考察三門課，其講授頗為學生稱道，「美洲細講成名課，經濟人生地理香」。[27]黃本人出身名校，英語流利，長於辭令，教課效果好，辦事效率高，又善於領導，[28]但他不得不屈居胡煥庸之下，而且

25 張印堂，〈中國人口問題之嚴重〉，《地理學報》，創刊號（1934 年 9 月），頁 1-17；涂長望，〈與張印堂先生商榷中國人口問題之嚴重〉，《地理學報》，卷 2 期 1（1935 年 3 月），頁 127-137。

26 Robert S. Platt Papers, Box 4, Folder 14, 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Archives.

27 徐近之，《英美閒吟》（杭州：杭州當代出版社，1947），頁 55。

28 吳傳鈞，〈發展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先驅〉（1996 年 5 月 30 日在黃國璋先生誕辰 100 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人文地理》，卷 11 期 3（1996 年 9 月），頁 1-2。

在中央大學，黃國璋無論在師承和地緣上都有被邊緣化的感覺，因此並非嫡系的他常有辭職的念頭。[29]而黃國璋最終從中央大學出走也頗費心思。

1936 年 8 月，中國地理學會在北平清華大學召開第三次年會，黃國璋決定利用北平年會，聯合北派謀求在中國地理學會中更大的話語權。中國地理學會設有九名理事，每三年改選一次，而此次北平年會正值改選之年。黃國璋聯合清華大學地學系的張印堂，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的王益厓（1902-1968），輔仁大學的張星烺，共四位理事提議修改章程，主張翁文灝仍爲會長，但由黃國璋擔任幹事，王益厓取代張其昀爲《地理學報》總編，王成組取代胡煥庸爲會計。這種提議將中國地理學會的幹事、編輯及會計全部置於北派手中，南派地理學者再無話語權，所以竺可楨聽聞後驚呼：「形勢大變……《地理學報》將難於爲繼。」[30]同時，爲了確保提案通過，北派提議由與會會員現場投票選舉。由於本次年會在北平召開，北平會員有地利之便，與會的 37 名會員，近一半來自北平。但是此提案當即被中央大學代表否決，因爲此次與會會員僅爲全體會員的十分之一，未達法定選舉人數。[31]王益厓和張印堂兩人心有不甘地前往南京，與翁文灝和竺可楨商談。但是翁、竺等人堅持章程的修改必須徵得多數會員的同意。[32]

謀求中國地理學會的控制權失敗之後，黃國璋難以在南京立足。1936 年 9 月，他正式離開中央大學，轉而擔任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黃國璋由此著手整合北派。首先，改造北師大地理系，以中小學地理教育爲發展方向，「凡有利於中小學地理教學之事項而本系人力物力所及者，無不規劃周詳，亟圖實現。」[33]黃國璋組織編寫地理教材，繪製教學用圖，成立諮詢處，並申

---

29 〈黃國璋在中國地理學會北京分會第四次會員大會上的檢討〉，《地理知識》，卷 3 期 7，頁 184。
30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6），卷 6，頁 134。
31 〈第三次年會紀錄〉，《地理學報》，卷 3 期 3（1936 年 7 月），頁 644-646。
32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6，頁 141-142；翁文灝著，李學通等整理，《翁文灝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74、89。
33 黃國璋，〈發刊詞二〉，《地理教學》，卷 1 期 1（1937 年 1 月），頁 2。

請中英庚款董事會資助兩萬元大洋，購買圖書儀器，充實該系。[34]同時，黃國璋創建《地理教學》雙月刊，作爲北派地理學者的重要陣地。

其次，黃國璋扶持張相文之子張星烺爲中國地學會會長，自己擔任副會長兼總幹事，正式與中國地理學會分庭抗禮。1936 年 11 月，黃國璋依照中國地理學會的組織模式，改造中國地學會；此外，鑑於《地學雜誌》內容陳舊，只是依據史例，搜羅故實，博採新聞，不符合現代學術規範，故將《地學雜誌》改爲以刊登研究論文、圖書評論和地理消息爲主，並附有英文提要，非常接近《地理學報》。[35]在研究方向上，黃國璋承襲北平地理學的研究傳統，側重邊疆地理，並籌建邊疆博物館，培養民眾的國家觀念。[36]在黃國璋的改造之下，北平成爲歐美地理留學生的重鎮，匯聚了張印堂、王成組、王益厓、洪紱以及張星烺等的留洋學者，形成地理學話語體系中（the discourse of geography）的洋務派，他們立足歐美，主張以西方地理學徹底改造中國地理學。

黃國璋改組北派之際，南派也在變動。1936 年竺可楨出掌浙江大學，並由弟子張其昀帶領中央大學地理系的部分班底，組建浙大史地系，迅速成爲南方地理學另一重鎮。浙江大學史地系與中央大學地理系同宗，一脈相承，共同構成民國地理學南派。與北派相反，南派竺可楨、胡煥庸等雖也曾分別留學美、法，但是他們立足本土，主張以中國語境融合西方地理學，即所謂的本土派。因此，南北地理學之爭的本質是本土派與洋務派之爭，其中最典型的是清華大學地理學教授洪紱與中央大學地理系王維屏（1906-1989）之爭。王維屏，江蘇江陰人，1934 年中央大學地理學系畢業後留作助教。1936 年 9 月，王維屏評論洪紱新作，對其地圖和數據提出意見，並比較胡煥庸的著作，認爲洪著雖簡略，卻不失爲一篇重要的地理研究。[37]留法博士洪紱讀後即發文反駁，認爲王維屏一知半解，像初中生一樣信口開河指責研究不精，而且坐井觀天，對於

34 〈師大地理系將製造分省地理模型〉，《世界日報》，1937 年 7 月 12 日，第 6 版。
35 林超，〈中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張相文和中國地學會〉，《自然科學史研究》，卷 1 期 2，頁 150-159。
36 〈中國地理學紀念三十周年，籌組邊疆博物館〉，《大公報》，1937 年 5 月 10 日，第 5 版。
37 王維屏，〈福建省土地利用和人口分布圖〉，《地理教育》，卷 1 期 6（1936 年 9 月），頁 46-49。

中國的地理學成績盲目樂觀。[38]洪紱以長者身分的訓誡引起王維屏極大不滿，他再次發文，稱介紹洪的文章全是好意，而洪的回覆完全超出學術討論之外，講了許多不倫不類的話；假若洪氏覺得自己的著作金甌無缺，那麼請有世界眼光的他對比一下歐美學者所做的圖志，自然可以知道自己的渺小。[39]這次南北之爭反映南北的研究範式不同，即北派偏於歐美範式，以中國證明歐美地理通則，而南派則立於本土，以中國地理融合歐美範式。此外，此次爭論已經超出學術範疇，言語間頗有意氣之爭。

總之，1936 年出走的黃國璋執掌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重組中國地理界的北派，與胡煥庸領導的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對峙，形成民國地理學術「南胡北黃」的格局。具體而言，北派由黃國璋領軍，以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和清華大學地學系為中心，依託中國地學會，主要人物有黃國璋、王益厓、張印堂、洪紱等留學歐美者，注重歐美地理範式；南派則以胡煥庸為領袖，以中央大學地理系和浙江大學史地系為中心，依託中國地理學會，主要成員有胡煥庸、張其昀、王維屏等，強調中國本土範式。自此之後，南北雙方在地理學術以及資源上相互爭鋒，門戶漸深，歷經戰爭和革命而不變，影響深遠。

三、機構之爭

1936 年的中國地理學會之爭，北派出師不利，但很快便因抗戰而結束，疆域淪陷，學人各奔東西，北平的中國地學會也暫停活動。黃國璋主持的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遷至陝南漢中盆地的城固縣，清華大學地學系遷往雲南昆明；而胡煥庸主持的中央大學地理系內遷至重慶沙坪壩，浙江大學史地系遷往貴州，在地域上再無南北。但黃國璋不久即到重慶，並聯絡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的張印堂和洪紱東山再起，而這次較量的陣地是中國地理研究所。

38 洪思齊，〈論福建地圖並答某君〉，《禹貢》，卷 6 期 2（1936 年 9 月），頁 77-78；〈論經濟地圖並答王君〉，《地理教育》，卷 1 期 7（1936 年 10 月），頁 43-45。

39 王維屏，〈答洪君〉，《地理教育》，卷 1 期 7（1936 年 10 月），頁 45-46。

1920 年代中期，自中央和北平兩研究院成立之後，重要學科如生物、地質、物理、化學，乃至社會、歷史、語言、心理，均設有研究專所，而地理一科，尚無特設機關。南派地理學者一直尋求建立專門的研究機構。1936 年胡煥庸呼籲創設地理研究所，廣聘積學之士，調查與研究並重，推動地理學術。[40]1937 年 4 月，中央研究院擬籌辦地理研究所，計劃聘請中央大學地理系奧籍教授費師孟（Hermann von Wissmann, 1853-1905），但因抗戰而中止。[41]1938 年中央大學地理教授丁驌擬訂地理研究所組織及五年工作計劃大綱。[42]1939 年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任鴻雋請求竺可楨兼辦地理研究所，聘請人才，竺氏擬將留英歸國的中央大學地理系畢業生任美鍔調往。[43]但中央研究院終因經費困難，無法辦理地理研究所，改由朱家驊（1893-1963）主持的中英庚款董事會接辦。

朱家驊出身浙江湖州富商之家，德國柏林大學地質學博士。早年追隨孫中山，歷任中山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浙江省府主席，中央研究院總幹事、院長，教育部長，國民黨組織部長等要職，在教育和學術界皆有重要影響力。作爲地質學博士和國民政府要員，朱家驊一直倡導重視地理學，他於 1928 年創辦中山大學地理系，而中山大學地理系因抗戰三遷，實力劇退，因此朱家驊決定利用中英庚款辦理中國地理研究所，維持他在地理學界的影響，並就研究範圍和計畫徵求李四光的意見。[44]朱家驊創建中國地理所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教育界抗衡陳立夫。朱與陳因輪流掌管國民黨組織部和教育部，用人行事相互排斥，勢同水火。雖然朱家驊在國民黨組織系統中的勢力不如陳立夫，但在文教界根基和人脈甚深。1938 年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長，在教育界擴充勢力，與朱家驊的勢力產生衝突。

40　胡煥庸，〈創設地理研究所之需要與計劃〉，《地理教育》，卷 1 期 6（1936 年 9 月），頁 1-3。
41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6，頁 285。
42　丁驌，〈地理研究所組織及工作計劃大綱試擬〉，《地理學報》，卷 5（1938 年 1 月），頁 1-9。
43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7，頁 43、114。
44　〈朱家驊啓李四光〉（1939 年 12 月 27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12-013-02，「中國地理研究所」。

1940 年 8 月，中國地理研究所在重慶北碚成立，下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大地測量和海洋四組，由黃國璋任所長，在西南和西北地區開展了廣泛而深入的地理考察，發表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45]黃國璋之所以得任所長，據說是因爲朱家驊 1930 年執掌中央大學的時候，有教員聯合反對他；時任地理系教授的黃國璋佯裝加入其中，探聽之後向朱家驊報告，朱因此心存感念。[46]黃國璋從此轉投朱家驊門下，二人關係非同一般。例如，1937 年朱家驊主持的中英庚款董事會，資助黃國璋二萬元充實北師大地理系；1939 年中英庚款董事會撥款成立川康考察團，以黃國璋任副團長。[47]

黃國璋以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兼任人文地理組主任，在其主持下，西北聯合大學地理系（原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師生佔據中國地理所的半壁江山，特別是在人文地理組 20 位職員中，8 位來自西北聯大，5 位來自西南聯大地質、地理、氣象系（地理系班底爲原清華大學地理系）。[48]例如薛貽源（1913-1957）於 1936 年入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攻讀，在黃國璋教導下研究經濟地理，1940 年畢業之後在中國地理研究所的人文地理組工作，參與漢中盆地調查，並編寫考察報告。[49]而同城的中央大學地理系，則很少有人廁身其中，中國地理研究所在一定程度上成爲北派的大本營。

在中國地理所時期，黃國璋還與同在重慶的禹貢學派創始人顧頡剛來往甚密。黃與顧二人在 1936 年相識於北平，[50]而顧頡剛本人和朱家驊也甚有淵源，1927 年朱家驊主政中山大學的時候，曾聘請顧氏前往廣州執教。1941 年顧頡剛應朱家驊之請到重慶主編《文史雜誌》，並兼任中央大學中文系和歷史系教授，以及出版部主任，經常與黃國璋出席朱家驊的宴請。顧、黃兩人在學術上

45 李承三，《中國地理研究所的六年和將來》（重慶：中國地理研究所，1946），頁 1-10。
46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8，頁 29-30。
47 〈中英庚款會撥款調查，川康開發積極〉，《申報》，1939 年 4 月 25 日，第 3 版。
48 侯學燾，〈解放前中國地理研究所簡況〉，收入《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紀念文集》（南京：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1990），頁 74-79。
49 劉培桐，〈悼念薛貽源同志〉，《地理學報》，卷 23 期 3（1957 年 8 月），頁 345-348。
50 例如 1936 年 10 月，顧頡剛在西直門車站初遇黃國璋；1937 年 5 月，兩人與洪紱等同赴福開森的宴會。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3，頁 541、648。

也常合作。1942 年 7 月，黃國璋邀請顧頡剛到中國地理研究所講演古代地理學史。[51]1945 年，北碚修志委員會成立，編修《北碚志》，顧頡剛爲主任委員，黃國璋爲委員之一。[52]

相對於與黃國璋的交好，顧頡剛與胡煥庸雖然同列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但是並無太多交流。胡煥庸自 1930 年任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抗日期間隨遷入川，1941 年任中央大學研究院地理學部主任。因爲中央大學直屬教育部，南派的地理學者得到陳立夫的支持，1941 年教育部在全國評選出 30 位「部聘教授」，地理門即爲胡煥庸，而且胡與陳氏的臂膀葉秀峰相熟，並通過葉爲中國地理學會申請經費，自然被朱家驊視爲 CC 派中人。爲了制衡胡煥庸的勢力，顧頡剛受朱家驊邀請在中央大學兼職，因此胡、顧二人矛盾日顯。1942 年顧頡剛被人誣告是共產黨，顧認爲是胡煥庸從中作梗。[53]1943 年胡煥庸任中央大學教務長，到顧頡剛任職的出版部查賬，顧氏認爲胡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伎倆中傷他。[54]而胡煥庸也一直抵制顧頡剛的兼職，堅持中央大學不接受兼職，只能專任。[55]胡煥庸的學生，繼任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李旭旦則批評顧氏管事太多，無一事做得好。[56]處境維艱的顧頡剛一度想辭職，但被朱家驊勸說不要辭職，否則胡煥庸將更得勢。[57]

黃國璋主持中國地理所時期，雖春風得意，但未能逃脫南派的批評。首先，南派認爲他主持的地理所計畫太大，不切實際，例如製作重慶二萬五千分之一的地圖，詳細探測大小三峽，因爲經費有限，設備極少，難有結果。[58]其次，黃國璋同時在中央設計局兼任設計委員，大半時間不在所裡，沒有盡力推動中國地理所發展，引起所裡不滿。再次，黃國璋社會活動較多，勤奮程度及學術

51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4，頁 704。
52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5，頁 487。
53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4，頁 656。
54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5，頁 57-58。
55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5，頁 166。
56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5，頁 660。
57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5，頁 130。
58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8，頁 150。

成果，都不如胡煥庸和張其昀。[59]最後，黃國璋的私生活也被南派詬病，例如黃國璋與老家的配偶未曾離婚，卻又在重慶與舊識結婚，西北聯大學生曾發傳單攻擊此事。[60]

中國地理研究所之爭，實際上是地理學的南北兩派各自藉助朱家驊和陳立夫的權勢之爭，杯葛對方，爭奪戰時稀缺的研究資源，在戰火中延續各自的脈絡。不過，黃國璋很快與朱家驊分道揚鑣，因爲中國地理研究所本來是朱家驊爲嫡系中山大學地理系畢業生和中英庚款留學生而設立的，而黃國璋本人並非朱家驊嫡系。更嚴重的是黃的社會活動太多，疏怠地理所的業務。1942 年底翁文灝談起黃國璋，表示朱家驊已經對其不滿。[61]因此，黃國璋最終去職。

四、爭取葛德石的支持

黃國璋憑藉與朱家驊的關係在中國地理研究所的爭奪中佔得先機，而在爭取葛德石的支持上，北派也是步步爲營。民國時期，美國地理學家葛德石（George B. Cressey, 1896-1963）因研究中國地理而聲名鵲起。葛德石於 1923 年至 1929 年曾任上海滬江大學地質地理系主任，1931 年起擔任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地質與地理系主任，1949 至 1952 年間任國際地理聯合會（IGU）主席。葛德石在中美兩國以及國際地理學界都有一定影響力，因此也成爲南北兩派爭取的對象。

在爭取葛德石的支持上，黃國璋又因爲私人關係佔據優勢。黃國璋與葛德石都曾在耶魯大學地理系師從亨廷頓學習一年，因此兩人有同門之誼。同時，黃國璋從芝加哥大學獲得碩士，葛德石則是芝加哥大學博士，因此兩人又有同校之誼。黃國璋與葛德石早在 1927 年就已結識。1928 年初，葛德石在美國農業部的朋友貝克（Oliver. E. Baker, 1883-1949）主持繪製世界農業地圖，中國

59 施雅風口述，張九辰訪問整理，《施雅風口述自傳》（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頁 80。
60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8，頁 43。
61 翁文灝著，李學通等整理，《翁文灝日記》，頁 837。

部分亟需有中國地理學背景的助手，葛德石即推薦黃國璋。[62]同年，葛德石計劃從上海返回美國之際，即向滬江大學推薦即將學成歸國的黃國璋接掌滬江大學地質地理系。[63]但滬江大學校方無意發展地理學，所以黃只好轉應竺可楨之聘，回國後至中央大學任教。

相對於南派地理學者，北派爭取葛德石支持的優勢並非只有黃與葛的私人之誼。1934 年葛德石出版成名作《中國的地理基礎》（*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在中國地理分區和地理方法上都有獨到之處。清華大學地學系的洪紱和張印堂都非常推崇葛德石之作。洪紱首先在《獨立評論》上介紹此書，同時致信感謝葛德石對理解中國的貢獻，[64]繼而在《清華學報》和《地理學報》上推介此書。[65]張印堂也在《清華學報》評論此書，[66]還在其著作《地理研究法》中推薦葛德石之書作爲大學地理教材。[67]因此，北平師範大學和清華大學都將葛氏的《中國的地理基礎》作爲教科書。與此同時，北派著手翻譯葛德石的著作。葛德石起初準備將其書交給自己的高足涂長望翻譯，但是涂氏前後蹉跎數年，並未完成。在黃國璋引薦下，改由北師大地理系的教師諶亞達來翻譯《中國的地理基礎》。[68]但諶亞達只翻譯了此書後十五章的分論部分，以《中國區域地理》爲名出版。[69]爲求完整，黃國璋又鼓勵北師大地理系學生薛貽源翻譯此書前六章的總論部分，完成後出版。[70]在黃國璋居間努力下，此書中文

62 "Baker to Cressey," Feb. 6, 1928, Box 14974, Folder 4, George B. Cressey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Archives.

63 "Cressey to Shanghai College," Feb. 21, 1928, Box 14974, Folder 1, George B. Cressey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Archives.

64 "Hung to Cressey," Dec. 24, 1934, Box 14959, Folder 28, George B. Cressey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Archives.

65 洪思齊，"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清華學報》，卷 10 期 3（1935 年 7 月），頁 791-801；洪思齊，〈介紹一本中國地理新著〉，《地理學報》，卷 3 期 1（1936 年 1 月），頁 203-209。

66 張印堂，"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清華學報》，卷 10 期 2（1935 年 4 月），頁 518-530。

67 張印堂，《地理研究法》（南京：正中書局，1937），頁 23。

68 "Chen to Cressey," Mar. 14, 1940, Box 14965, Folder 8, George B. Cressey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Archives.

69 葛勒石（George B. Cressey）著，諶亞達譯，《中國區域地理》（南京：正中書局，1947）。

70 葛德石（George B. Cressey）著，薛貽源譯，《中國的地理基礎》（重慶：開明書店，1945）。

譯本得以面世，葛德石對此深表感謝。

無論在私人情誼還是學術交往，葛德石似乎成爲北派的專利，北派也因此受益。1943 年 11 月，葛德石作爲美國國務院訪問教授抵達重慶。在戰時中國，葛德石不僅意味著地理學術聲譽，同時意味著稀缺的資源。黃國璋主持的中國地理研究所聘請葛德石爲兼任研究員。[71]葛德石不但提供中國地理研究所關於邊疆地理研究的學術建議，[72]而且請求美國國務院郵寄 1939 年以來的《地理評論》（*Geographical Review*）和《美國地理學家協會會刊》（*Annu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等刊物給中國地理研究所。[73]

1944 年 5 月，葛德石另一本有關亞洲地理的重要著作《亞洲之地與人》（*Asia's Lands and Peoples*）在美國出版，其熟諳亞洲地理，頗有見解，風行一時。[74]隨後由西南聯合大學的張印堂主持翻譯出版。1944 年 6 月，葛德石結束訪華返美，黃國璋請顧頡剛賦詩四首贈別，詩稱葛德石「曾寫歐文禹貢書」，並感謝兩人多年來的友誼。[75]相對北派的熱情和推重，南派與葛德石多爲學者之間的君子之交。例如竺可楨直至 1947 年訪問美國時，才在旅途中利用周日讀完《中國的地理基礎》一書，認爲書中東北三省部分大致說來尚不算錯，但是葛德石以爲東北三省終屬中國，無論何人阻礙前途必將後悔一說，未免對中國人過於樂觀。[76]1950 年，竺可楨在南京會晤任美鍔等南派子弟時表示，中國地理學家應寫一本《中國地理》替代葛德石的書，並且計劃作一書評，指出葛氏的錯誤。[77]

---

71 "Chu to Cressey," Dec. 7, 1943, Box 14974, Folder 13, George B. Cressey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Archives.

72 "Cressey to Huang," Jan. 10, 1944, Box 14973, Folder 11, George B. Cressey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Archives.

73 "Cressey to State Department," Dec. 27, 1943, Box 14973, Folder 11, George B. Cressey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Archives.

74 葛德石（George B. Cressey）著，張印堂、劉心務譯，《亞洲之地與人》（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譯者序。

75 〈爲黃海平贈葛德石教授〉，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5，頁 292。

76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10，頁 392。

77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12，頁 177。

當北派以美國地理學家葛德石為重之際，南派的浙江大學史地系卻在中國發掘明代學者徐霞客，其表面契機是因為浙大的抗戰內徙路線與徐霞客當年的遊蹤不謀而合，更重要的是浙大史地學系藉此自豪其堅持史地兼修的治學理念，立足本土，注重從歷史中發掘地理，「造就史學與地學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聯繫性，俾專精與通識得其平衡」。[78]作為江南鄉賢的徐霞客則成為最好的歷史資源。1941 年，浙江大學藉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之際舉辦紀念會，在肯定丁文江發現徐霞客功績的基礎上，將其定位為一名以科學精神治地理，以實地考察為基礎的地理學家，[79]南派意在將西方地理方法嫁接在中國文本之上，建立中國地理學的學術範式。

葛德石之爭實際上反映黃國璋和張印堂等人利用英語優勢以及對歐美地理學的熟習對抗南派。因為南派的胡煥庸只是在法國遊學，張其昀則沒有留學經歷，因此無論英語，還是對美國地理學的了解都不如北派。因此北派在黃國璋主導下，壟斷中國對葛德石的解讀和影響，挾美國地理學術壓制南派。南派則擺脫全面宗法西方地理學的階段，選擇傳統鄉賢徐霞客，以科學主義為利器，從中國本土重建現代地理學，塑造中國自己的地理學家。[80]而北派擁葛德石自重，也為日後中共紅色政權批判美帝國主義時被株連埋下伏筆。

五、「分省方案」之爭

1945 年抗戰勝利，南北地理學派的紛爭並未隨之結束。除了學術資源、研究範式，兩派對於行政區域劃分的看法也歧異。南北兩派關於分省的爭論，始於戰時，1947 年 11 月行政院院長張群表示行憲之後的第一件大事為縮小省

78 〈國立浙江大學文學院、師範學院史地學系概況〉，《史地雜誌》，卷 1 期 3（1940 年 9 月），頁 63。
79 葉良輔，〈丁文江與徐霞客〉，收入浙江大學編，《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刊》（遵義：浙江大學，1942），頁 6-9。
80 張雷，〈再造徐霞客──民國科學地理學〉，《地理學報》，卷 72 期 9（2017 年 9 月），頁 1695-1701。

區，此番表態將分省論見之爭公開化。[81]中國由於省區過大，一省相當於歐洲一國，之下設道，實行省、道、縣三級制，疊床架屋，政令不暢。清末康有爲曾發表〈裁行省議〉，攻擊行省和督撫制度，主張以道代省，集權中央。民初宋教仁主張縮小省區，熊希齡和范源濂等人均提出改革意見，但政局分亂，終成空論。1930 年國民黨四中全會再提重劃省區，其目的是縮小省區，形成省縣兩級制，以便政令通行。分省是地理學家的專長。1930 年代，洪紱利用現代地理學理論和方法進行地理區劃，論及省區劃分，而張其昀也有改革省區的基本原理討論。[82]

1939 年國防最高委員會設立省制問題設計委員會，邀請胡煥庸等人主持研究戰後分省問題，實行省縣二級制。胡煥庸等人研擬了〈縮小省區方案〉，但戰事正緊，方案隨即擱置。1944 年戰爭漸至尾聲，中央設計局成立區域設計組，聘請黃國璋擔任組長，主持省區劃分方案。胡、黃兩人雖然同爲分省設計的參與者，由於理念和規則不同，南北兩派提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案。1945 年出任國民政府方域司司長的地理學家傅角今（1896-1965），後來將這兩個方案分別稱爲「析省派」和「調整派」。[83]

南派的胡煥庸與張其昀是所謂的「析省派」，他們認爲中國原有省界多與自然區域相合，即使有不合之處，因爲省制已行七百年，歷史的事實已變成地理的因素，因此應盡量保存原有省界，不必多事更張，置原有省界不顧。[84]他們主張以現有的道爲基礎，將一省分爲數省，例如江蘇分爲三，即江海省、淮揚省、徐海省，全國共分爲 65 省，每省轄 25 至 40 縣。[85]而對於北平，只是將其作爲津海省或冀北省的一個城市，甚至連省會都不是。北派的黃國璋與洪紱則屬於「調整派」，他們認爲現有省制立基於元代的省區，實爲軍事區域，

81 張其昀，〈省區評議〉，《思想與時代》，期 49（1947 年 11 月），頁 4。
82 張其昀，〈改革省區之基本原理〉，《時事月報》，卷 4 期 3（1931 年 3 月），頁 157-166；卷 4 期 4（1931 年 4 月），頁 237-247。
83 傅角今，《重劃中國省區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84 張其昀，〈省區評議〉，《思想與時代》，期 49，頁 4-5。
85 胡煥庸，〈縮小省區方案之一〉，《社會公論》，卷 3 期 2-3（1948 年 2 月），頁 4-9。

目的是控制鎮壓，不適合民主自治，而省界更是犬牙交錯，相互牽制，不符自然。因此，他們主張打破原來的省道府州界線，完全以自然區域爲根據，重新劃分省區。具體而言，依據河流和分水嶺重劃省界，將全國分爲 57 省。同時，爲了突出北平的地位，建議在北平設立平海省，與南京的京海省相對。[86]

南北分省之爭背後其實還是雙方對於中國本土歷史文化見解的分歧，是洋務派與本土派之爭的升級。南派大將張其昀承襲南高柳詒徵的文化民族主義，抗戰期間，與錢穆等以《思想與時代》刊物爲陣地，追尋民族文化血脈，肩負文化託命責任，[87]因此在分省方面，張其昀主張尊重歷史，在地理上保持原有省區，以省內的道爲基礎實行分省。而北派則繼承了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遺產，特別是洪紱作爲抗戰時期「戰國策派」的幹將，[88]主張批判和重估傳統文化，因此堅持全面推翻歷史上的省區，依據自然地理區域重建。

南北兩派的分省方案中還隱含首都之爭。北伐期間，地理學界就出現關於首都的爭論，北方的白眉初與南方的張其昀圍繞北京與南京的優劣進行了論戰。[89]抗戰後期，南北又掀起還都何處之爭，南北兩派觀點對立。北派以洪紱爲主，從戰略地理學角度論證戰後國防重點是東北，北平對外便於指揮攻守，對內便於控制統一，宜爲首都。[90]南派的張其昀、李旭旦等則主張還都南京，例如張其昀認爲南京坐擁江海，爲全國經濟中樞，是國防計畫的頂點，並提出定都南京的十大理由。[91]論戰最終以還都南京而塵埃落定。

86 洪紱，〈重劃省區草案大要〉，《地理教學》，卷 2 期 1（1947 年 3 月），頁 2-8。

87 南派的文化保守主義，自然爲北派學界所批評，例如顧頡剛曾在日記中批評道：「張其昀有政治野心，依倚總裁及陳布雷之力，得三十萬金辦《思想與時代》刊物於貴陽，又壟斷《大公報》社論。賓四、賀麟、蔭麟等均爲其羽翼。」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4，頁 602。

88 戰國策派是 1940 年以《戰國策》半月刊和重慶《大公報．戰國副刊》爲陣地的一個文化流派。主要成員以清華大學背景的教授爲主，有林同濟、陳銓、雷海宗等，主張對傳統文化和民族病症批判爲基礎，呼喚民族競存精神，提倡國家主義和英雄崇拜，具有強烈的德國文化色彩。洪紱是戰國策派中運用地緣政治的主角，作爲地理學家，他致力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國家的地略、國策與戰爭的關係，參見江沛，《戰國策派思潮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89 白眉初，〈國都問題〉，《國聞周報》，卷 5 期 25（1928 年 7 月）頁 1-9；張其昀，〈中國之國都問題〉，《東方雜誌》，卷 24 號 9（1927 年 5 月），頁 1-8。

90 洪紱，〈漫談幾種建都的理論〉，《東方雜誌》，卷 40 號 7（1944 年 4 月），頁 23-26。

91 張其昀，〈首都十論〉，《勝流》，卷 5 期 1（1947 年 1 月），頁 6。

南派胡煥庸的分省方案呈交中央設計局之後，被中央設計局區域設計組組長黃國璋改成甲方案，將全國分爲 42 省，1 個地方（即西藏），11 個特別市及旅順、威海衛、澎湖群島等海軍要塞區。胡氏讀過之後，感嘆與其原研究出入甚大。北派黃國璋等人的〈縮小省區計劃草案〉則爲乙方案。[92]兩派針鋒相對，互不妥協，在期刊報紙上互有攻防。北派指責南派只採取權宜之計，但將一省瓜分爲數省，遷就地方舊勢力，不求省區一致；[93]而南派則認爲胡氏的方案兼備學術和實用意義，爲抗戰期間中國政治地理研究的最大貢獻。[94]南北兩派的分省方案之爭，最終因中華民國政府退守臺灣而封存。

總之，自抗戰以來，北派的黃國璋善於利用個人交誼和政治關係掌握資源，爲北派爭得一席之地。他先是利用與朱家驊的關係，主持中國地理研究所，將北派的大本營從偏在漢中盆地的西北聯合大學移至重慶，與南派一較高下；其後利用與葛德石的私人交誼，壟斷葛德石對中國的解讀和影響，挾美國地理學壓制南派；之後又通過中央設計局區域組組長的職務，在分省方案之爭中盡得先機。黃國璋將學術與政治聯繫的運作模式屢試不爽，戰後他還要複製這套模式。

六、南北合流

1946 年黃國璋回到北平，重整北派地理學。首先，黃國璋與輔仁大學歷史系主任張星烺共同恢復中國地學會，推舉張星烺爲理事長，自任副理事長兼總幹事，並代表中國地學會參加全國 12 個科學團體在上海舉行的年會。其次，在北平師範大學，黃國璋由地理系主任升爲理學部主任，不久改爲理學院院

---

92 朱恆齡，〈縮小省區問題：訪問胡煥庸教授〉，《中央日報》（南京），1947 年 11 月 28 日，第 3 版。

93 洪紱，〈重劃省區方案芻議〉，《東方雜誌》，卷 43 號 6（1947 年 3 月），頁 1-23。

94 徐近之，〈抗戰期間我國之重要地理工作〉，《地理學報》，卷 14 期 3-4（1947 年 12 月），頁 50。

長。[95]1948 年 4 月，中央研究院選舉出第一屆 81 位院士。同年 8 月，北平研究院也選出 90 位會員，與中央研究院院士遙相呼應。其中，北平研究院地理學的會員爲黃國璋和張印堂。[96]不過戰後，張印堂出走美國，洪紱未回北平，因此，清華大學重新聘請王成組擔任地理學教授。[97]黃國璋與王成組同爲芝加哥大學地理學碩士，聲氣相投，共同主持北派。

地理學術之外，黃國璋長袖善舞，熱衷社會活動。1943 年黃國璋在重慶期間，因與九三學社創始人許德珩的內弟是同學，得以結識許氏，成爲創始人之一。九三學社於 1946 年正式成立，被選爲常務副理事兼總幹事的黃國璋，利用學社身分參與戰後政治。更重要的是，黃國璋與毛澤東有同學關係。黃國璋來自湖南湘鄉，與毛的家鄉湘潭比鄰而居，兩人同在湘鄉的東山高等小學就讀，1911 年又同時考入湘鄉駐省中學。因此，1945 年黃國璋曾與各界人士到機場歡迎前來重慶參加國共和談的同學毛澤東。1949 年 1 月，黃國璋所在的九三學社與北平文化界人士聯合發表聲明，擁護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平主張。6 月，毛澤東前往北師大探望並宴請黃國璋等湖南師友。獲政治垂青之後，黃國璋積極參與中共新政協的籌備工作，並當選爲九三學社中央理事會理事兼秘書長。

1949 年 7 月，政治加持之下的黃國璋召集全國地理學界會議，明確袪除宗派主義，商議合併北平的中國地學會和南京的中國地理學會。[98]1950 年北平復名北京，中國地學會與中國地理學會合併爲中國地理學會，黃國璋爲理事長，王成組爲總幹事。[99]北派如願以償收編中國地理學會，執掌全國地理學，而南派大將張其昀避走臺灣，胡煥庸因爲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及教務長的身分成爲政治賤民，奉命到中共的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受訓」。[100]1950 年夏，

---

95 〈袁敦禮過滬赴京商師院復大辦法〉，《申報》，1948 年 4 月 5 日，第 6 版。
96 〈國立北平研究院學術會議今閉幕〉，《申報》，1948 年 9 月 9 日，第 7 版。
97 王成組 1923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後被派往美國留學，1929 年回國被聘爲清華大學地理教授，1932 年之後輾轉廈門、上海等地執教，1947 年應清華之聘，重回母校任教。
98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11，頁 478-480。
99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12，頁 28。
100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11，頁 532。

胡煥庸受訓結束，落選地理學專門委員會委員，同時因政治身分問題無人聘用，[101]後只得暫寄淮河水利委員會。[102]

南胡已倒，北黃尚在，但黃國璋的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也是曇花一現。因爲黃國璋出身富紳之家，留學美國，而且擔任過前朝的中國地理研究所長，中央設計局區域設計組組長，與國民黨政府關係密切，在劫難逃。[103]1952 年 3 月，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黃國璋因太太和女婿均爲國民黨復興社社員，被九三學社撤除秘書長和理事職務。[104]失去政治身分的黃國璋成爲砧板上的魚肉。4 月，中國地理學會北京分會批判黃國璋是地理學界的學閥，製造派系，大肆宣傳極爲反動的美國地理學，一貫從事反革命活動，竊據地理學會理事長職位，是人民中國地理學界的極大恥辱，建議撤銷其會籍、理事、理事長等職。[105]黃國璋隨後作公開檢討，最後只被保留中國地理學會的會籍。1952 年 9 月，黃國璋被發配西北。[106]

結　語

民國地理學因爲學術傳統和範式不同而有南北之分。1936 年黃國璋主持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與胡煥庸主持的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南北呼應，形成中國地理學上「南胡北黃」的格局。具體而言，北派是以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清華大學地學系和燕京大學歷史系爲中心，依託中國地學會和禹貢學會，強調歐美地理學範式；南派則是以中央大學地理系和浙江大學史地系爲中心，依託中國地理學會，側重中國本土地理學範式。兩派之爭始於學術傳統和地域

[101]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12，頁 115。
[102]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12，頁 182。又可參見胡建中，《梅花香自苦寒來：紀念先父胡煥庸教授誕辰 110 周年》（北京：時代弄潮文化發展公司，2011），頁 154-155。
[103] 黃國璋的政治命運早有徵兆，作爲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他本來具有出席 1949 年第一屆新政協會議的資格，但因國民黨掌權時代曾赴集中營演講，被人告發，因此被摒除資格。參見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11，頁 541-542。
[104]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12，頁 583。
[105]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12，頁 600。
[106]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12，頁 696。

分異，繼而擴展至地理學會、學術機構、學術範式，以及學術研究，終以政治收場。

地理學的南北分野不僅契合民國學術的南北分野和政治中心的轉移，同時反映中國本土地理範式和西方地理範式之間的張力，深刻影響著中國地理學的構建與敘事。1952 年民國地理學界的「南胡北黃」格局成爲歷史，但是剛剛平息本土派與洋務派之爭的中國地理學，又起新的宗派。以孫敬之爲首的中共紅色地理學家，依靠政治優勢強勢上位，而南派的精神領袖竺可楨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和中國地理學會會長的尊位分管全國地理學，以浙江大學史地系和中央大學地理系的門生爲基礎，一統民國地理舊人，形成中共建政之後的民國地理學派。民國地理學派在竺可楨領導下與延安的紅色地理學家平分秋色，左右中國大陸地理學格局數十年。[107]與此同時，民國地理學史也變成以竺可楨爲一尊的書寫。

107 例如 1992 年，中國科學院地學部有 7 位地理學院士，分別是任美鍔、譚其驤、黃秉維、周立三、侯仁之、施雅風、陳述彭。其中，任美鍔、譚其驤和黃秉維均曾執教浙江大學史地系數年，施雅風和陳述彭則爲浙大史地系畢業生。因此 7 位院士之中，只有侯仁之和周立三沒有浙大背景，可見竺可楨主持的浙大地理學派在建國之後的影響。參見陳述彭，〈浙大史地系——12 年生活、學習與工作的回憶〉，收入韓存志主編，《資深院士回憶錄》（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卷 2，頁 131。

徵引書目

一、史料、檔案

〈本會發起旨趣書〉，《地理學報》，創刊號，1934 年 9 月，附錄，頁 1-2。
〈朱家驊啓李四光〉（1939 年 12 月 27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12-013-02，「中國地理研究所」。
〈第三次年會紀錄〉，《地理學報》，卷 3 期 3，1936 年 7 月，頁 643-646。
丁驌，〈地理研究所組織及工作計劃大綱試擬〉，《地理學報》，卷 5 期 1，1938 年 1 月，頁 1-9。
王成組，《中國地理學史（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王庸，《中國地理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王鈞衡，〈亞洲的地體構造和地勢配置〉，《地學雜誌》，卷 20 期 2，1932，頁 89-110。
白菱漢（Jean Brunhes）著，張其昀譯，竺可楨校，《人生地理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任美鍔，〈最近三十年來中國地理學之進步〉，《科學》，卷 30 期 4，1948 年 4 月，頁 103-113。
李承三，《中國地理研究所的六年和將來》，重慶：中國地理研究所，1946。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 6-8、10-12，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6。
施雅風口述，張九辰訪問整理，《施雅風口述自傳》，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洪思齊，“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清華學報》，卷 10 期 3，1935 年 7 月，頁 791-801。
洪思齊，〈介紹一本中國地理新著〉，《地理學報》，卷 3 期 1，1936 年 1 月，頁 203-209。
徐近之，〈抗戰期間我國之重要地理工作〉，《地理學報》，卷 14 期 3-4，1947 年 12 月，頁 31-56。
徐近之，《英美閒吟》，杭州：杭州當代出版社，1947。
涂長望，〈與張印堂先生商榷中國人口問題之嚴重〉，《地理學報》，卷 2 期 1，1935 年 3 月，頁 127-137。
翁文灝，〈清初測繪地圖考〉，《地學雜誌》，卷 18 期 3，1930，頁 110-143。
翁文灝著，李學通等整理，《翁文灝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
張印堂，“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清華學報》，卷 10 期 2，1935 年 4 月，頁 518-530。
張印堂，〈中國人口問題之嚴重〉，《地理學報》，創刊號，1934 年 9 月，頁 1-17。
張印堂，〈中國古代文化之發展及其地理背景〉，《地學雜誌》，卷 20 期 2，1932，頁 79-88；卷 21 期 2，1933，頁 183-194。
張印堂，《地理研究法》，南京：正中書局，1937。
張其昀，〈近二十年來中國地理學之進步（上）〉，《地理學報》，卷 2 期 3，1935 年 7 月，頁 93-131。
張其昀譯，〈歷史地理學〉，《史地學報》，卷 2 期 2，1922 年 1 月，頁 73-77。

陳述彭，〈浙大史地系──12 年生活、學習與工作的回憶〉，收入韓存志主編，《資深院士回憶錄》，卷 2，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頁 123-136。

傅角今，《重劃中國省區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葉良輔，〈丁文江與徐霞客〉，收入浙江大學編，《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刊》，遵義：浙江大學，1942，頁 6-9。

葛勒石（George B. Cressey）著，諶亞達譯，《中國區域地理》，南京：正中書局，1947。

葛德石（George B. Cressey）著，張印堂、劉心務譯，《亞洲之地與人》，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葛德石（George B. Cressey）著，薛貽源譯，《中國的地理基礎》，重慶：開明書店，1945。

鄒豹君，〈山東省農產區域之初步研究〉，《地學雜誌》，卷 26 期 1，1937，頁 53-89。

劉培桐，〈悼念薛貽源同志〉，《地理學報》，卷 23 期 3，1957 年 8 月，頁 345-348。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3-5、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George B. Cressey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Archives.

Robert S. Platt Papers, 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Archives.

二、報刊雜誌

《大公報》（天津），1937。

《大公報．史地周刊》（天津），1934、1936。

《中央日報》（南京），1947。

《世界日報》，1935、1937。

《史地雜誌》，1940。

《申報》，1939、1948。

《地理知識》，1952。

《地理教育》，1936。

《地理教學》，1937、1947。

《東方雜誌》，1927、1944、1947。

《社會公論》，1948。

《思想與時代》，1947。

《禹貢》，1934-1936。

《時事月報》，1931。

《國聞周報》，1928。

《勝流》，1947。

三、專著

江沛，《戰國策派思潮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吳忠良，《傳統與現代之間：南高史地學派研究》，北京：華齡出版社，2006。

胡欣，江小群，《中國地理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胡建中，《梅花香自苦寒來：紀念先父胡煥庸教授誕辰 110 周年》，北京：時代弄潮文化發展公司，2011。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郭雙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陳寶雲，《學術與國家：〈史地學報〉及其學人群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楊吾揚，《地理學思想簡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劉盛佳，《地理學思想史》，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鞠繼武，《中國地理學發展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

四、論文及專文

吳傳鈞，〈發展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先驅〉（1996 年 5 月 30 日在黃國璋先生誕辰 100 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人文地理》，卷 11 期 3，1996 年 9 月，頁 1-2。

林超，〈中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張相文和中國地學會〉，《自然科學史研究》，卷 1 期 2，1982 年 4 月，頁 150-159。

侯學燾，〈解放前中國地理研究所簡況〉，收入《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紀念文集》，南京：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1990，頁 74-79。

張雷，〈再造徐霞客——民國科學地理學〉，《地理學報》，卷 72 期 9，2017 年 9 月，頁 1695-1701。

Divisions among Geographers in China, 1936-1952

Zhang Lei*

Abstract

In 1936 China developed two divergent schools of geographers in Beijing and Nanjing respectively. The northern school led by Huang Guozhang, the head of the geography department at National Beiping Normal University, highlighted the geographical practices follow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while the southern clique marshaled by Hu Huanyong, the chair of the geography department a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emphasized Chinese geographical pattern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derived from their distinct academic traditions and locations, which later caused rivalry in geographical organizations, institutes, paradigms, and research. Although the two schools were finally ended by the Communist regime, the division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had not only coincided with political friction but also reflected the paradigmatic tension between Chinese geography and Western geography, and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writing of Chinese geography.

Keywords: Huang Guozhang, Hu Huanyong, Chinese Geoscience Society,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history of geography

* Department of History,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